

贵州威宁县采集标本，刘老师见到动物标本不顾山水寒冷连鞋带袜下水前去追捉，汽车驾驶员受感动，自动下水帮助。1963年刘老师去宝兴采集标本，当时已经63岁，他和驾驶员炊事员住在森林中伐木工人留下的草蓬里，1965年他利用去攀枝花看望四川医学院工作人员的时候，回来时沿西昌、石棉、冕宁一带采集标本，以他这样大的年龄和他的职务和地位，本可以得到一些照顾，但他都婉言谢绝。”1973年刘老师已经73岁高龄，他又一次率领四川医学院生物教研组的李之珣、田婉淑、陈树荣等教职工去宝兴县采集标本，为纪念这次采集，他写下了如下的诗句‘踏遍青山人未老，愿为祖国献余年，七三好似三九壮，采得湍蛙著新篇，五龙溪畔听蛙喧，夹金山麓捉角蟾，回首远看云压顶，低头近见水冲天’。刘承钊老师相同事曾经先后到过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河北、山东、江苏、甘肃、青海等省区进行考察和采集标本。是什么思想支配着他作如此艰辛的科研工作呢？正如他自己所说：“某项科学只要在实践中建立了认识，并且判定他对人民有用，我就要为之斗终身。”他又说：“中国科学家有责任用中国人的第一手科学资料，开拓出自己的科学领域。”因而他工作时一丝不苟，严格认真，身上有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

刘承钊老师一生的辛劳，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他一生共发表了60多篇论文和著作，其中一些是他单独研究发表的，另一些是与其他人共同研究发表的，1950年出版了他在旧中国时代所撰写的《华西两栖类》一书，1961年出版了他与胡淑琴合作写成的《中国无尾两栖类》一书，这本书获得了1987年中国自然科学二等奖，同时这本书也为编写《中国动物志·两栖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在纪念刘承钊老师诞生9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的高尚品质，把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刘承钊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们心中，他在科研和教学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雁窝塘畔的追忆

刘益康*

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父亲讲他在野外采集的故事。讲采集故事、也是父亲最喜欢的话题。那些充满探索、冒险的经历；那些四川西部充满神秘色彩的风土人情；那一张张泛黄的反映过去时代的照片，曾激起过我无数的遐想，在我脑海中留下父亲的形象是：他是一位为寻觅真知不畏艰险的探险家。

长大以后，我成了一名地质工作者，终于有机会去亲身体会父亲所走过的路了。

有一次，我从昭觉去西昌。西出昭觉城，过了四开，沿公路盘旋上升，到了解放沟。这里完全是彝族聚居的地区。过了解放沟，公路渐隐没在一片迷茫的云雾之中。突然，我们的汽车坏了，司机在修车，看来一时还难以修复。我便信步向前走去，浓雾迎面扑来，寒气逼人，过了一会儿雾渐渐散开，只见前方有一个木牌，走近一看，上面写着“雁窝塘”。原来，就在这里留有父亲坚实的足迹和他的故事……。我环顾四周，在木牌的旁侧有一条潺潺流水的小溪，蹲下来一看，溪中的石隙间，有几只父亲心爱的硕大蝌蚪正在这刺骨的冷溪中悠然自得地嬉游。我凝神地看着它们，此情此景，使我在茫茫的白雾中，不由得追忆起父亲给我讲过的故事，还有那些泛黄的照片也都映入了眼帘……。

1942年5月上旬，一位来自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的教授和他的两位同事踏进了这莽莽灌木丛生、荒草齐腰、海拔3200米空气稀薄的雁窝塘。在那时，这里是没有公路的，从西昌走到这大凉山的腹地雁窝塘，父亲是靠着那穿着草鞋的双脚走了三天才到这里的。他肩上扛着一个须臾不离的采集网，背着一个背包，腰间系挂着几个大小不一的布口袋，腿上裹着绑腿，脚上穿着厚布袜和草鞋，一身褪了包的衣裤不少地方还

*本文作者刘益康系刘承钊教授的长子。现任冶金工业部西南地质勘查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中国金属学会理事；中国冶金地质学会理事；四川省地质学会理事长。

本文转载自赵尔宓主编《从水到陆——刘承钊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1990年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

打着补丁。就这样，父亲和他的采集队在迷茫的白雾中艰难地行进着。此时父亲心中还揣着一件心事，就是这一带当时为奴隶社会制，奴隶主要抓“娃子”去当他的奴隶。因此随时都有被抓去当“白彝”娃子的危险。在浓雾中，影影绰绰见山坡上有几个人影，是不是遇到了抓娃子的？周围一片恐怖气氛。父亲知道，如果一旦被抓去，那将是铁镣枷身，永无回还的希望。想到第一个孩子——我快出生了，当了娃子则一辈子就再也见不到家人了。父亲不由得闪过犹豫的念头，怎么办？放弃？！回去？！不，不能！现在仅仅是采集的前奏，探索两栖爬行动物奥秘的强烈欲望和采集标本的冲动，驱使父亲又迈开他的双脚，依然越过刺骨的冷溪，踏过荆棘丛生的小径，默默坚毅地向前走去。父亲就这样，以他顽强不屈的精神去寻找宝贵的第一手标本资料。为发掘我国丰富的两栖爬行动物资源，为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年复一年地积累着来之不易的资料。

再说他们在途中实在太饿了，就啃几口前几天煮好的冰冷土豆，渴了就喝上几口溪水。在那艰苦的年代，大蒜成了在野外防止生病最经济最简便的“处方”，还可借此冲淡饿觉。父亲有一双既能涉水又能攀登高岩的脚，有一双能极其熟练地挥动着采集网的手和有敏锐观察力的眼睛。当他发现了他心爱的猎获对象时，什么危险、饥饿、疲劳都暂时忘却了。父亲很敏捷地就网到了蝌蚪，小心翼翼地放到玻瓶内，若采到了成体，那就更是喜形于色了，赶紧把它们放进布口袋内，垫上湿草，沿途还要不时地浸湿一下布袋，让它们在里面生活得更舒适一些。

走着，采着，夜幕渐渐降临，雾色更浓，隔几步远的景色就看不清了，浓雾中又传来噢噢的嚎叫声。标本到手了，父亲此刻才意识到处境的危险。他迅速隐没在浓雾之中。我记不得以后的故事了。可以想象得出，那天晚上，父亲可能蹲在一个山洞里，也可能蹲在一片荒草滩上度过的。因为至今雁窝塘前后几十公里也还是没有村落居民的。好在父亲在野外已习惯于随遇而安的生涯，破庙、荒野中的小茅屋都是他曾经栖身过的地方。

汽车马达声又响了，使我又想起了一个故事，父亲告诉过我，当年从成都到西昌的公路是既窄又崎岖不平，汽车又旧又老，走走停停，还不得不经常下来推着它前进。从山腰俯视下面奔腾的大江，就像一条很细的丝带，蜿蜒伸向前方，这是多么险峻的情景。还有父亲当年要走六天的路程，现在仅需两个小时就可从西昌到达昭觉了。

汽车开动了，惜别了雁窝塘，然而追忆的故事还没有完。到了西昌，我一定要去看看东门城下的一所小医院。到了医院门口，我好像看到了父亲那极为消瘦的面庞。父亲曾在这里战胜死神。事情是这样的：他离开雁窝塘后，步行到昭觉，次日就发高烧，随即昏迷了近十天，那时的昭觉，完全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父亲就躺在用两根树干做成的担架上，被抬到了西昌这所医院，经确诊为“斑疹伤寒”。途中全是靠自己的抵抗力挺过来的，五十天后才逐渐康复。八月初，他一个人带着少量但几乎是用生命换来的标本回家来了。望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我笑了，望着母亲笑了。这笑蕴藏着父亲的一片爱心及庆幸得以生还之心情。这些往事的回忆，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因我的工作关系，每次我从野外调查回来，总要向他老人家讲一路旅途的风光见闻，这也是父亲在晚年最爱听的话题。有一次，我讲到康定道孚间的松村口，真没想到事隔三十年来，他对那里的每条小径、每条小溪，还记得那么清楚，因为那是他追求的事业所在。他永远是不会忘记的。

诚然，我不懂两栖动物分类学，但每当我翻开《华西两栖类》和《中国无尾两栖类》这两本凝聚了父亲一生心血的专著时，我眼前浮现出父亲几十年来是如何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踏遍山山水水，用自己的双手亲自捕捉，在室内精心整理，把这些无比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总结在他的专著中。父亲实现了他的宿愿：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在他从事的科研领域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的著作广为国内外同行者引用，也赢得了他们的赞誉。

父亲离开我已整整十四个年头了。我在雁窝塘畔瞬间的追忆，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带走对父亲深切的怀念。